

點上最後一支煙斗……

君特·格拉斯 (1927-2015)

畫畫人格拉斯

二〇一〇年寫完長篇《格林的詞語》後，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2015)說，要將「畫畫」當作一個新的開始。那之後，他寫得越來越少，畫得卻越來越多。格拉斯晚年的水彩畫，大多描摹德國鄉間景致，用色明亮，不再充斥着《鐵皮鼓》的震顛和壓抑以及《蟹行》中行文用筆的動盪磨折了。就像他的德國同鄉、作家黑塞在世道混雜時退守田園習畫種花一樣，格拉斯在獲諾獎名利俱收的人生高點選擇默默退離，轉入繪畫的語境中探求並發掘，倒也頗有些中國古代隱士「乘桴浮於海」的聰慧豁達。

職業是畫家，寫作乃自學

關於文畫兼修，格拉斯並非個例。善作文章又習得幾筆好畫的作家，在古代有蘇軾有趙孟頫諸人，近代也不乏泰戈爾、卡夫卡、托爾金和汪曾祺等。這些性情和生活環境迥異的名家，畫風也自然不乏差別。卡夫卡的鋼筆畫和他的文章一樣，灰暗，清冷，有種說不出的壓抑；泰戈爾的畫與詩都很飽滿，情緒開合大，不避諱不躲閃；至於汪曾祺，恬淡慣了，作文寫畫都有種深秋裡北京胡同閒坐聊家常的舒服，旁人想仿還真是仿不來的。格拉斯對於繪畫和視覺藝術的喜愛，並不是晚年才培養出的喜好。小學的時候，他在美術老師的指導下練習鉛筆畫，十三歲那年已然立下「以繪畫和雕塑為終生事業」的夢想。後來，二戰爆發，夢想遭擱淺。好不容易熬到戰爭結束，當時是德國海軍潛艇兵的格拉斯離開戰俘營與沖沖去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報了名，卻又在數月後被告知學校停課，只能往礦區工作。環境艱苦，他卻因此練就一手雕刻本事，為他後來進入柏林藝術大學學習雕塑打下基礎。其後，格拉斯因《鐵皮鼓》和《狗年月》等出名後，還曾去過柏林藝術學院當了幾年主席，無怪他自己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的職業是畫家，寫作其實是自學的。」

契合心靈的創作

俄國文學批評家巴赫金曾在《想像的對話》一書中提到「chronotope」這個概念。在書中，巴赫金將其形容為某種時間和空間的綜合體，並將「chronotope」置於小說和史詩等文本中分析。在我看來，「chronotope」提供了一個關於「時機」(timing)的學理上的讀解。這詞在語意和現實情境中強調的，不外是「碰巧我也在」和「偏偏就是你」之類近乎奇跡般的緣分。其實，我們如果回望格拉斯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創作歷程，不難發現他每一階段的創作風格——不論小說抑或畫作——都是與作家彼時彼處的心境兩相契合的。

上世紀四十年代尾，格拉斯在復課後的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學習版畫，深受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家奧托·潘科克影響。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是二十世紀初流行於歐洲的藝術流派，它有意忽視寫實的具象的描摹，強調創作者對於心緒和情感的直陳。那時候的德國出現了一批表現主義畫家，包括馬爾克和鮑默等。他們的畫大多顏色鮮艷且色彩間衝撞強烈，不講求構圖的理性和平衡，常用誇張扭曲的人體和物件表述心情。受此風格影響的格拉斯在創作上也試着拋開平衡和謹嚴，將情緒的高低起伏放大至極限。

於是，在一九五九年的《鐵皮鼓》、一九六一年的《貓和鼠》以及一九六三年的《狗年月》(合稱「但澤三部曲」)中，讀者在文本中見到的意象大多是誇張變形甚至離奇荒誕的，比如《鐵皮鼓》中只有三歲孩童的身高卻像成年人一樣思考的奧斯卡，以及《狗年月》中的白骨山和黃粉幼蟲。同樣地，作家在這一時期的畫作中，也充斥着誇張、變形和無休止的對抗。格拉斯常用剪刀和長針這樣鋒利的意象，且有意忽視寫實，令到那些鉛筆畫和版畫看上去凌亂無秩序，很有些恐慌和蕭條的意味。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格拉斯開始動筆寫《比目魚》。這本洋洋灑灑五十萬字的小說借用了格林童話中《漁夫和他的妻子》的故事。在童話中，漁夫那貪婪的妻子試圖用比目魚完成自己全部的心願，而在格拉斯的小說中，比目魚成為某種符號及隱喻。在前西德審判法庭上，這條魚講述了九位廚娘的故事，並透過這些故事反映兩性不平等這一從古至今都未曾改變的令人遺憾的事實。書中的比目魚走出童話語境，成為過往千百年裡罪惡和醜陋的見證。在牠身上，失望和絕望交替，現實與虛構交織。書中那句「比目魚吻了我的嘴，因此我的靈魂無家可歸」也被格拉斯具象化為一件雕塑。作品中，比目魚貪婪地試圖去吻身旁的女人，女人的眼睛裡沒有眼珠，空洞地敞開着。

與世界握手言和

如果說格拉斯的青年和中年時代一直在憤怒和掙扎，那麼一九九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的他，漸漸放下那些因外部環境強加於己身的過分熾烈的情緒，轉向內在向自身觀照。這老人依舊叼着煙斗，偶爾在報上撰文批評以色列政府和核武器等等，但他的畫風再不是當年凌厲甚至囂張的樣子了。他開始畫水彩，用極溫柔的表情和筆調，描述自己生活的周遭。一棵樹，一片雲，等等。正像黑塞用水彩畫描摹故鄉並試圖從自己的作品中尋找倚靠和安全感那樣，格拉斯晚年的水彩畫中，依稀是七十多年前其童年習作的模樣。

這位一輩子努力着扼住命運咽喉的作家和鬥士，終於在老耄之年默默放下過往的怨怒哀傷種種，以一位畫家而非作家的姿態，與這不完美的世界握手言和。
我不由想起貝多芬晚年那五首樂四重奏，褪去「英雄」交響曲和「皇帝」鋼琴協奏曲中的角力和掙扎，用「漸癒病人對神的感恩節聖歌」式筆法，留下宛如墓誌銘一般的生之終曲。
文：李夢

4月13日，被譽為「德國良心」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呂貝克去世，享年87歲。留在喜愛他的讀者腦中的，是他的炯炯目光與那燃着輕煙的「格拉斯的煙斗」。

格拉斯1927年出生在但澤市，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卡舒比人，父母是雜貨店的老闆。出生在這樣一個中下階層的家庭中，格拉斯總在狹小的空間中幻想自己想要的東西，也很小就學會了在嘈雜的環境中閱讀，並開始了寫作和繪畫。他曾對《巴黎評論》的記者說，自己小時候是個「大話王」，總想像出美妙的故事，把謊話說得天花亂墜。「因此我從小就開始把自己的謊話寫下來，我還堅持下來了！十二歲的時候，我就開始試着寫本小說，小說是關於卡舒比人的，很多年後她們出现在了《鐵皮鼓》裡，主人公奧斯卡的祖母安娜，就像我自己的祖母一樣都是卡舒比人。但是我的第一本小說犯了個錯誤，在第一章結束的時候我所有的角色都已經死完了，我就寫不下去了！這就是寫作中的第一個教訓：小心處理角色的命運。」(這段話真應該讓喬治·馬汀來聽聽，《冰與火之歌》還沒寫完，「領便當」的角色已經堆成小山了！)

總而言之，格拉斯從小就對寫作與繪畫情有獨鍾，在他出版的書籍中，你會不時看到他精心繪畫的封面和內頁插圖。事實上，這個不甘寂寞的老爺爺涉獵的領域十分寬廣，他寫小說寫詩寫散

文寫劇本，也畫畫和作雕刻，更熱衷於政治評論，時常火氣十足地在報紙上撰文批評時局。他的政治觀點與他的人生一樣充滿爭議：他公開質疑兩德統一，炮轟德國的軍工業，指責以色列政府秘密發展核武……2006年，借自傳《剝洋葱》的出版，他公開承認自己曾加入納粹黨衛軍，一時輿論嘩然。

1959年出版的《鐵皮鼓》是格拉斯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它與後來的《貓與鼠》、《狗年月》一起構成了「但澤三部曲」。《鐵皮鼓》是主人公奧斯卡自述的人生經歷，這個先天具有可以擊碎玻璃的刺耳尖叫的小男孩，在目睹成人世界的污濁和罪惡後決定停止長大，永遠維持三歲小男孩的身體，只是整天敲打着一隻鐵皮鼓，以發洩對畸形社會的憤慨。整部小說充滿了黑色幽默與荒誕驚人的意象，展現了德國納粹時期最黑暗的一段歷史，被認為是歐洲魔幻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品。1999年，瑞典學院授予格拉斯諾貝爾文學獎，稱《鐵皮鼓》是「20世紀長盛不衰的文學作品之一」。

不久前的3月18日，舞台劇《鐵皮鼓》在德國漢堡的塔利亞劇院首演，格拉斯還親自到場觀看，並在演出結束後與演員們一道謝幕。如今，鐵皮鼓還在繼續敲響着，背後的老人



■格拉斯的代表作《鐵皮鼓》

卻已告別人生的舞台。瑞典學院說格拉斯：「回憶那些被否認與被遺忘的東西，從此承擔了回顧當代史的重大任務。」點上最後一支煙斗，回憶永不消逝。
文：尉瑋

■格拉斯創作雕塑 網上圖片



閱讀格拉斯



書名：鐵皮鼓
譯者：胡其鼎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但澤三部曲」的第一部。三歲的奧斯卡無意中發現母親和表舅布朗斯基偷情，又目睹納粹勢力的猖獗，便決定不再長大，寧願成為侏儒。從此在他的視角裡，社會和周圍的人都是怪異和瘋狂的。他整天敲打一隻鐵皮鼓，以發洩對畸形的社會和人世間的憤慨。根據本書改編的同名電影獲得了1980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書名：我的世紀
譯者：蔡鴻君
出版：時報文化

格拉斯運用敏銳多感的敘說方式，鉅細靡遺地描繪20世紀的時代流變，引領讀者回顧德國百年來的歷史軌跡。在《我的世紀》中，格拉斯以一百篇小品故事為寫作架構，搭配上自己所創作的一百幅水彩畫，從1900年一路蜿蜒到1999年，從科學發明、壓迫謀殺、戰爭、疾病，抒發其對全人類的關懷和對未來新世紀的期許，讓時代的記憶點滴再現，訴盡德國百年來市井小民的辛酸悲喜。



書名：剝洋葱：鈞特葛拉斯回憶錄
譯者：魏育青、王濱濱、吳裕康
出版：時報文化

「回憶就像一顆要剝皮的洋葱。洋葱皮層層疊疊，剝掉又重生；如果用切的，洋葱會讓你流眼淚，只有剝掉它，洋葱才會吐真言。」本書回憶格拉斯從童年到寫作《鐵皮鼓》之間的成長歲月。透過他的回憶，個人與民族複雜的歷史一層層地被攤開來，其過程既痛苦又辛酸，就像剝洋葱的過程一樣。雖有評論認為這是極其優美的文學作品，但卻給格拉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麻煩，因為他在書中首次公開了一個被埋藏六十多年的秘密……



書名：貓與鼠
譯者：蔡鴻君、石治之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貓與鼠》敘述了中學生馬爾克進入青春期的後的一系列經歷。他喉結格外大，動似老鼠，便設法做出許多不平凡的事來掩蓋這一缺陷，甚至偷了一個軍官的鐵十字勳章，被學校除名。入伍後他因作戰英勇果實榮獲了勳章，回到母校卻依然受歧視，便一怒之下打了校長，從此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小說反映了納粹時期學校與軍隊之間的對立，揭露了法西斯意識形態和荒謬的英雄崇拜對學生的毒害。